

文海徐探

姚雪垠題

WEN HAI XU TAN

目 录

从“阿Q”到“陈奂生”	(1)
超凡脱俗的《女神》	(17)
《林家铺子》简论	(27)
《当铺前》的思想和艺术	(38)
《四世同堂》中的北平文化	(49)
吴王金戈越王剑 ——《胆剑篇》漫评	(62)
赵树理小说的表现方法	(87)
思想的胜利 美学的胜利 ——艾青《光的赞歌》	(96)
科学的诗篇 ——《哥德巴赫猜想》	(104)
花样翻新的《风筝飘带》	(114)
《冬天里的春天》的结构艺术	(126)
《蒲柳人家》及刘绍棠小说的民族化 和乡土化特点	(135)
人生路上的周而复始 ——路遥《人生》人物分析	(151)
《棋王》中的王一生	(161)
从科尔沁走出的两个年轻人 ——江浩、白雪林小说风格比较	(167)
我读《蓝幽幽的峡谷》	(181)

大跃进民歌得失谈·····	(188)
丰厚的思想内涵	
——读《在破败的古堡旁》·····	(195)
他坚持走自己的路	
——读丁茂短篇小说集《阴影》·····	(199)
关于“遐思”的遐思	
——包象万散文集《暮的遐思》简评·····	(205)
一本适时而又出新的书	
——读《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史》·····	(210)
《黑玫瑰》二题·····	(215)
乡土文化与乡土文学·····	(225)
后记·····	(240)

从“阿Q”到“陈奂生”

阿Q早被砍了头。他的灵魂是完全进了天国，还是残存在尘下？人们细细探究，争论不已，莫能定说。几十年光阴过去，人们正要将他忘却，陈奂生却悠悠问事，举手投足，分明带着阿Q的“神韵”。人们惊骇之余，又开始探究起他们的“血缘”关系。

阿Q之所以成其为阿Q，“精神胜利法”是他主要特征。他之所以用这种“精神胜利法”，软弱性、麻痹性（即奴性）是其产生的基础。没有软弱性、麻痹性，他就不会有“精神胜利法”，有了软弱性、麻痹性，他必然产生“精神胜利法”。首先，由于他软弱可欺，然后他才会自欺欺人，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无房无地，更无妻子儿女，有的只是一身气力，整日给人家打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只为填饱肚皮，没有更高的生活奢望。由于经济地位的低下，决定了他政治地位的低下，不知受过多少人间的屈辱。赵太爷姓赵，便不许他姓赵，他无意说一句自己姓赵，竟实实在在挨了一个大嘴巴。人家赵太爷孙子都快出世了，还要娶个小的，而他到了而立之年，仍是光棍一条，一时冲动，向吴妈求了一次爱，却闹得身败名

裂，挨了打，挨了骂，又被勒索得精光，做奴隶而不可得。没有办法，他得偷、得抢，成了“氓流”。钱秀才和赵秀才的棍子随时可以敲到他的头上，他不敢反抗，他也根本不想反抗，地保可以敲诈他，要钱的闲汉们可以欺骗他，甚至连王胡都敢拽住他的黄辫子根儿在墙上撞几个响头。对于这些，他心里是愤愤然的；但又奈何不得，最好的办法是精神战胜，从自己心里寻求安慰，明明是穷困交加，一无所有，被人盘剥和嘲弄，他却用“先前阔”，以后“还要阔”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补现实的不足。由于生理上的缺憾，长了一头“癞疮疤”，平时总是受人取笑和污辱，他竟然能用“你不配”来战胜别人，“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闲人们还不完，继续撩他，打他，他又能以“儿子打老子”来安慰自己。闲人们仍不完，一边打他还要让他自己说是“人打畜生”，他竟然自己比畜生更降了一格，说是“打虫豸”，平白无故地挨了一顿打，又自己骂了自己，他却觉得是胜利者，因为他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除“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不但没有降低身份，似乎倒增加了名望。平时和人家要钱，他总是输个精光，好不容易赢过一回，人家耍了个圈套，把他赢得钱一扫而光，他经过一时的痛苦，“但立刻又转败为胜利了。他擎起右手，用力就在自己的脸上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不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刺刺，——心满意足的得胜地躺下了”……他一生充当的始终是受气的角色，而“精神胜利

法”是他唯一的生活支柱，我们既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又实在为他的愚顽而痛心，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陈奂生是新社会的农民，比起阿Q，他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政治地位提高了。阿Q当奴隶而不可得，陈奂生却应该是社会的“主人”了。阿Q向吴妈求爱闹起了轩然大波，到死仍然是光棍一人，而陈奂生却有妻室儿女，而且生活一步步有了转机；阿Q连攀附个赵太爷竟不可得，甚至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力，陈奂生却得到了县委书记的“高级关心”；阿Q下场是个大悲剧，陈奂生却在喜剧的氛围中开始了新的生活……，“凡此已可说明一个论点，就是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你怎么再在陈奂生身上去找阿Q精神胜利法的‘原版’表现？陈奂生决不会向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高精、尖’阶段发展了”。（范伯群《陈奂生论》载《当代作家评论》84.1）

那么是不是陈奂生与阿Q气质的关系不大了呢？不。陈奂生身上确实体现着“阿Q气”，这也正是我们要探究的中心。陈奂生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最普通的最平常的农民群众，“他的大半生生涯中，自己从未当过干部，也无当过干部的亲戚，或当工人的子女”，他“经济上无依无靠，政治上无权无势”，一年上五百四十七个工，干起活来不怕碰破了头的响当当的劳动力，却挣不饱自己的肚子，有时竟饿得头昏目眩，因为到处借粮，被村干部名之曰“漏斗户主”。顶着个“漏斗户”的帽子，他经常被人嘲笑，他心里嘀咕，“这是富人嘲笑穷人，地主嘲笑农民”，可他反抗了吗？没有。他不敢反抗，他是软弱可欺的，正因为他的软弱可欺，他才处处得不到实惠，物质上的不足，他便在精神上补，也就是

运用了“精神胜利法”，本来他的日子是漏斗式的，多少年滚着爬着过日子，直到打倒“四人帮”，他才能用“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自己动手做油绳”，起早爬半夜到城里去卖，目的是换“一顶簇新的，呱呱叫的帽子”，因为他多少年没戴帽子了，二元五一顶的帽子对于他是最大的需要。因为没有帽子，再加上贪黑熬夜，病倒在城里的火车站，县委吴楚书记对他进行了“高级照顾”，把他送进了高级招待所，谁想到好心办了坏事，一夜之间竟花掉他五元钱，把两顶帽子都搭了进去，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先是气愤，忧然，但转念一想，“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了！”精神马上轻松了许多。当然，这到底是不小的损失，可怕的是回去无法向老婆交差，冥思苦想，终于石破天惊，想出了最充足的理由，得到最大精神安慰——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麼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象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象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我们看看，这和阿Q有多么的相似！

如前所述，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基础是奴性，如果他没有奴性，绝不会受那么多的欺侮，受了欺侮也会拍案而起，迎头反抗。奴性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强者的畏惧和向往，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于弱者的藐视和侮辱上。阿Q长了一

头癞疮疤，尽受侮辱，他开始是：“口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便打”，反过来说，口硬的便不敢骂，气力大的便不敢打，欺软怕硬。因为说句“姓赵”，赵太爷竟打了他的嘴巴，他不敢还手也不敢还口，而因为虱子没有人家捉得多，却向王胡挑战，因为赵太爷是强者，王胡是他眼里的弱者。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敲在他的头上，他缩着脖子挺着，反过来拿无辜的小尼姑撒气，因为“假洋鬼子”是强者，小尼姑是弱者。经过“恋爱的风波”之后，赵家将他赶出大门，逼得他连出卖劳动力的地方都没有了，他不敢找赵家算帐，却把帐算在瘦骨伶仃的小D头上，因为赵家是强者，小D是弱者。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德行！

陈奂生怎么样？也是如此。他苦苦地劳作，却挣不上一家人的口粮，人说他是“漏斗户”，他心里发怒，却不敢还嘴，对于领导他是百分之百的敬仰和畏惧，他“别的不惧，难道连‘干部比爹娘大’这个道理还不懂吗？爹娘打骂儿女，历来理所当然，这比爹娘大的干部，倒反为请他出山跑酸了腿，岂不要折了他的阳寿！”，吴书记到他家去过一次，给他孩子买过“一包块块糖”，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住过高级的房间，感到身价百倍，逢人便吹，可一宿用掉两顶帽子的钱，“出了大价钱”又“不曾讨过大姑娘的欢喜”女服务员的脸子冷冰冰，说话象菜刀剁着砧板似的笃笃响”，他只是憋气，并没有什么反抗的表示，连一句硬话也没敢说，回到房间又来了能耐，一肚皮气朝那些无辜的物件撒开了，踏在照人影的地板上也不脱鞋了，坐瘪了“弹簧太师椅”也不害怕了，扬起提花枕巾就擦他那油腻的脸，衣服不脱就在于干净净的新被子上辗转起来……这不也正是一种

欺软怕硬的奴性吗？女服务员是他眼里的强者，他不敢碰，没有生命的物件当然是弱者，他把对强者的满腔怒火统统发泄在弱者身上。可悲！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阿Q和陈奂生虽然不能划等号，但确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二

阿Q和陈奂生相隔几十年，又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为什么能够“一脉相承”呢？

恩格斯说过：现实主义的作品“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段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阿Q正传》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陈奂生上城》也是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佳作；阿Q是一个文学典型，陈奂生也是个典型人物，这两个典型人物都植根于典型环境之中，所以说，环境的内在联系，是造成人物性格内在联系的基础。

阿Q生活的具体环境是旧社会的未庄。这里的霸王是凶残的赵太爷，因为他姓赵，竟然不许阿Q姓赵，阿Q说了一句姓赵，便挨了他一记耳光，阿Q向吴妈求爱，他便乘机大作文章，把阿Q骂一通、打一通，又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使阿Q除了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之外，其余什么也没有了。钱秀才是个“两性”人物，既是封建遗少，又是个“洋人”的走狗，他骨子里是统治阶级思想，做梦都想爬入上层社会，可辛亥革命一来，他竟然闻风而动，首先混进了革命队伍，假惺惺地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革掉了。真心

要革命的阿Q却被他的“哭丧棒”吓得瘟头瘟脑。而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物，如王胡、小D、小尼姑、吴妈、邹七嫂等等，他们受尽了剥削和凌辱，精神又是那样呆滞，甚至把统治阶级视为圣人。阿Q因说了一句姓赵，挨了一顿屈打，这些人不但不为阿Q鸣不平，却“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阿Q稀里糊涂地被杀了头，未庄的人没有同情“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试想，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产生个阿Q，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陈奂生生活的具体环境怎么样呢？我们说，它比阿Q生活的环境好得多。共产党的干部吴楚绝不象赵太爷那样欺压百姓，他“当了那么大的官”，仍然和下层人民没有思想隔阂，但并非人人都是吴楚。我们且不要把它描绘过于纯美，这里还有许多令人叹气的地方。队里的干部，由于执行极“左”路线，说假话，浮夸购过头粮，造就了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漏斗户”。而对于这些阶级兄弟，他们不但不同情，反而嘲笑，呵斥，正如陈奂生所愤愤然的：“这是富人嘲笑穷人，地主嘲笑农民”；那城里某厂的王厂长，高科长，“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搽了红粉，藏着黑心，开口为人民服务，伸手捞黄金钞票，婊子装正经”；那某厂的年轻采购员，依仗厂子大，手段高，那样的盛气凌人，香烟尽吃人家的，衣服脏了还得别人给洗；而小厂的采购员林真和，由于厂子小，手段小，被人看不起，“要想搞一点东西，一直是磕头跪拜求人的”哪个有办法，他“服侍也肯，跑腿也肯，花小钱也肯，做小媳妇做惯了”。谁说当今世界是纯而又纯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群众和群众的关系，不见得都

是十分正常的，有些人并不比赵太爷，“假洋鬼子”善良多少！七八十年代的群众，比一、二十年代的群众当然要进步得多，但是，一些陈旧愚腐的东西也没有完全从他们身上清除掉，陈奂生的老婆生怕自己的丈夫被旁的女人勾引去了，

“两只眼睛就把他盯紧了”，丈夫五元钱住一宿栈房，她总怀疑“是有人陪丈夫困的”；那招待所的女服务员竟然是那样的“感情丰富”，听说陈奂生要算帐，她恋着报纸，并不抬眼看人；一听说住在最东那一间（高间），“连忙丢开报纸，甜甜地笑了”，可听陈奂生说了句外行话，立刻看出他“不是个人物，话也不甜了，象菜刀剁着砧板似的笃笃响，”更有那队里的人们，对于陈奂生坐上了县委书记的汽车，住上了五元钱一宿的栈房，那样的羡慕，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了，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些人啊，简直就是新时代的王胡、小D、邹七嫂……！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我们的陈奂生。

具体环境如此，大的社会环境如何？

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败涂地，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一方面把封建地主阶级作为统治中国的支柱，同时又竭力培植为他们服务的买办阶级对中国实行全面的掠夺。更加可恶的是，他们为了达到长久欺压中国人民的目的，竭力奴化愚弄中国人民，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外卑躬屈膝，一副奴才嘴脸，对内残酷剥削压迫，竭

尽搜刮征敛之能事。因此，国势衰微，民怨沸腾。无耻的统治者输了不认输，打肿脸充胖子，用各种各样的大话为自己开脱罪责，同时，以各种各样的谎言麻痹劳动人民。

马克思说过：“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本身代表着社会统治物质生产力量的阶级，同时就是这个社会统治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底手段，所以，由于这个，那些没有手段以进行精神生产的阶级，一般说来，同时就服从于这阶级。”以此说来，清朝统治者的自欺欺人精神，一定会影响到末庄，影响王胡、小D之流，阿Q当然也在被影响之列。

陈奂生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早被赶跑，封建统治阶级早被赶下了历史舞台，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器，不是欺压人民而是千方百计谋取人民的幸福；不是欺骗人民而是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的觉悟。单从这方面来说，似乎没有产生“阿Q精神”的土壤，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封建历史毕竟太漫长，“精神胜利法”也是由来已久，而且一代传一代，我们不妨罗列几个例子：

春秋时“圣人”孔子，被陈国人包围，绝粮七日，饿瘪肚子，他却用“君子固穷”来自我标榜；在宋国，被桓魋包围，好不容易逃出一条老命，又吹嘘“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匡地，他又被老百姓驱逐，一边逃跑还免不了吹牛：“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些是不是“精神胜利法”在作怪呢？

宋朝统治者，对外族的入侵，束手无策，落魄丢魂，一面向人家俯首称臣，甚至称儿子，卑躬屈膝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另一方面，却倒驴不倒架，厚颜无耻地向国人叫

嘘大宋帝国的威风，这是不是“精神胜利法”在作怪呢？

清朝皇帝腐败无能，明明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清宣宗的批语却说成是“妥为招抚”，明明是被迫开辟通商口岸，清朝皇帝却恬不知耻地宣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奏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这又是不是“精神胜利法”在作怪呢？

是的，经济基础能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人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引起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改变，“人的观念，观点，概念、简言之，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改变而改变的。”但这种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不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旧思想带着一种惯性必然要侵入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开始长时间的绞杀，所以李希凡说：“阿Q精神麻痹症的‘起着作用’，可能超越它的特定历史时期，也可能残留在新的时代里，甚至维持到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想清洗阶级社会中残留的悲惨的人性歪曲，却还需要共产主义的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作持久不懈的工作。”（《典型新论质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阿Q生活的具体环境，社会环境和陈奂生生活的具体环境，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区别，但也有一定的联系。这“区别”决定了陈奂生决不是“原版”的阿Q，这“联系”，决定了陈奂生身上带有十足的“阿Q精神。”

三

从阿Q到陈奂生，使我们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多，且历史久长，从奴隶社会至今，我们的经济都是以农业为首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农民也是伟大的农民，从古至今，他们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他们与人奋斗，不断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自由，但是，伟大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因其伟大而忽视他们的弱点，我们分析农民的弱点，也应该从历史着眼，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又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始终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的国家，一个封建宗法制度绝对统治的国家，一个极其闭塞的国家。小生产本来就是私有者，他们的眼光不能不受到私有制极大的限制，而一向紧紧伴随着小生产的封建宗法制度和闭塞性，更严重地阻碍了他们政治思想的进展，我们农民有其革命性，更有其局限性，我们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壮举中能看到农民的伟大，但从他们的失败教训中又能总结出他们的弱点，这些弱点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政治教育的加强，会逐渐克服，但想一下子清除掉却并非易事，人的传宗接代，并不完全是肉体的传承，思想的传承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改朝换代，也并不能马上对每个人都“刮骨疗毒。”所以，对农民的教育问题，是一长期的过程，艰苦的过程。我们党，我们国家，在发动农民，领导农民运动方面做过很

多努力，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失败的因素很多，但有一条重要的因素便是对农民估价太高，本来他们思想觉悟，文明程度还是低层次的，便大哄大嗡，大搞政治运动，结果搞得他们糊里糊涂，懵头转向，无所适从，而一些野心家正好利用农民愚昧的一面混水摸鱼，以实现自己的野心。

从文学的角度说，封建时代的作家大多看不起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农民，在他们笔下，或者是读书知礼的公子，或者是才貌双全的千金；或者是为民除害的清官，或者是精忠报国的英雄，或者是仗义疏才的好汉，或者是拦路抢劫的强人……，而且中国传统小说一般是注重写外而不注重写内；注重写行动，举止，不注重刻画灵魂；注重宏大热闹的场景，不注重细致入微的写人的意识活动，所以，真正写农民，写农民灵魂的作品微乎其微。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目睹反动统治者的对人民欺压，愤怒异常，对于人民所受的灾难无限同情，他盼望人民起来反抗黑暗统治，然而偏偏有很多人是软弱的，麻木的。他痛心疾首，怒其不争，如此，他的《阿Q正传》问世。鲁迅说，“我虽然试作，但终于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很显然，鲁迅要通过作为农民的“阿Q”反映“国人的魂灵”，亦即揭示“国民性”“国民的劣根性”。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是特定的，是有着具体的社会、历史、阶级的内容的，但这个典型人物的社会意义，却远远超越一定社会、历史、阶级，影响深远，获得不朽的艺术生命。

《阿Q正传》之后，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不少，茅盾的《春蚕》、《当铺前》；叶紫的《丰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都是影响极大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主要反映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对农民的遭遇寄予无限的同情，却不把反映农民的“魂灵”作为重心。

“乡土文学”小说家在反映农民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许杰的《赌徒吉顺》，台静农的《天二哥》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的劣根性”但是，这类作品不多，大部分作品在于揭示民情，民风 and 农民的苦痛。

赵树理是农村题材小说的专家，反映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属于现代文学的翘楚之作，《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二诸葛”，《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的劣根性。”

解放以后，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小说的宗师，写了一大批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长篇小说《三里湾》，中篇小说《锻炼锻炼》，短篇小说《登记》等，扛鼎于当代文学。他笔下的那些“中间人物”，如“糊涂涂”，“铁算盘”，“能不够”、“常有理”、“惹不起”（《三里湾》）， “吃不饱”、“小腿疼”（《锻炼锻炼》）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的劣根性”。但是，第一，赵树理写的都是“问题小说”，带着“问题”写小说，以解决“问题”作为小说的主旨，因而，他笔下的这些“中间人物”实际是做为对应的一极出现，他们和另一极的对应冲突，便显现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而冲突的结束，也就是“问题”的解决。如《三里湾》中的“糊涂涂”、“铁算盘”、“常有

理”、“惹不起”、“还不够”等，是和王金生、王玉生、王玉梅等相互对应的，他们之间的对应冲突，即反映了建国之初，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而《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小腿疼”等是和杨小四等相互对应的，通过他们之间的对应冲突，反映了农村两种思想的斗争。如此，作家便不能集中全部笔力，刻划这些带有“国民劣根性”的人物。第二，赵树理善于几笔勾画出一个人物，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一举手，一投足，无不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他的笔却不善于直抵人物的灵魂，所以，他的人物刻划属于浅层次的，不能获得深层的思想内蕴。基于这两点，他的这些带有“国民劣根性”的形象便不能取得振聋发聩，慑魂动魄的影响。

赵树理之外，其他一些作家也曾写出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国民劣根性”的人物，如梁三老汉（柳青《创业史》）、菊咬金（周立波《山乡巨变》）、赵满囤（马烽《三年早知道》）、孙喜旺（李准《李双双小传》）、“弯弯绕”、“马大炮”（浩然《艳阳天》）等等，这些人物都是引人入胜的，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都难以发人深省。

大跃进时，小说家大多为其笔下的人物注入了足量的“激素”，“老的象黄忠，年轻的象赵子龙，妇女都象穆桂英”，难以找到缺憾。

“文革”时，文学成了表现阶级斗争的工具，小说中的人物的品格完全由其家庭出身所决定，贫下中农立场坚定，大公无私，有一点缺点，也是一时糊涂，或受阶级敌人的蒙蔽，挑拨；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大多是自私自利，动摇观望，最容易受阶级敌人指使，利用；地主、富农则集一